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黎澍自选集

LISHUZIXUANJI

黎澍自选集

黎 澍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黎澍自选集

黎澍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1 插页 360 000 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18-02833-0/K·631

定价：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言^①

编一本选集列为“学术精华”，免不得叫一声“惭愧”。因为前半生从事新闻工作，文章多谈时事政治，与学术无关。解放以来，政治运动频繁，动辄卷入旋涡，不但与学术无关，甚至连政治也只剩了捕风捉影的空谈。比较起来，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选文即以此为范围，旧作除个别外不入选。

编入本书的各篇，主题不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也是值得指出的，这就是在这里开始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问题。此书要义，即在这里。

未附几篇回忆录和一份简历，以代自传。

是为序。

1988年11月

① 这篇序是黎澍于1988年秋根据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编委会的要求为他自选的书而写的，现书名已改，但为了让读者了解黎澍在选编此书的用意，只有发表原序为好。

目 录

序 言	1
消灭封建残余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1
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	29
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51
“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	
——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61
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	73
论提高	82
正确理解“古为今用”	89
中国社会科学 30 年	93
1979 年的中国历史学	116
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	126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	129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	151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169
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185
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	195

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201
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213
与《求是》杂志记者的谈话·····	216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222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232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	270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奋斗·····	283
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 ·····	301
论五四运动·····	340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	35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意义·····	367
共同创造一种讨论学术问题的高尚风格	
——在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386
让青春放出光辉! ·····	390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序 ·····	397
唐振常著《章太炎吴虞论集》序·····	400
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	402
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	406
谷斯范著《新桃花扇》序·····	415
《莫理循文书集》中译本序言 ·····	418
早期教育革命亲历记·····	422
记湖南《观察日报》·····	432
记湖南《开明日报》·····	444
胡愈之、范长江和国新社·····	451
早岁那知世事艰	
——记在成都《华西晚报》的经历·····	455

记上海《文萃》周刊和《文萃》三烈士·····	474
未完的记忆·····	488
作者简历·····	493
后 记·····	496

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1979年是要求我们对历史作一番认真的回顾并对其中一些问题切实加以考虑的年头。因为到这一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五四运动距离我们60周年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了。中国革命经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党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胜利的到来依然是很快的。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破坏，还造成了长时期的大倒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倒退深深地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中国民主革命早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社会也早已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严重现象？今天，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我们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万里长征。在未来的征途上，怎样才能使这种复辟危机不再发生，使我们的事业不再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这是摆在人们面前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目的在分析封建势力得以继续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说明彻底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

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 传统思想影响之深广

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如西周封建论，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论，秦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等，都还是有待进一步证明的假说。但是不论最后何说得到公认，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从古代到近代很少进步，实际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方式没有改变。马克思说：“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①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它的地理发现，例如经现在的甘肃、新疆和中亚各国到中东的通道的发现。这个通道还被西方历史学家美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它是中国丝绸运往西方的大路。但是中国的丝织业并未由于得到这个市场而导致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马克思认为，直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还可以从英国人同中国的通商看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马克思说：“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71～372 页。

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①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权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后，不但没有认识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必要性，积极为之倡导，而且对这种变革的趋势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抵制，以维护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地位。这就不仅是一个改革社会制度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思想革命的问题。

在中国进行这样一场思想革命，使人们乐意接受封建生产方式的改变，实在比登天还难。因为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西方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是在中国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要使中国人接受它，首先必须使他们认识有这种必要。但是中国人长期缺乏这种认识。最早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认识到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的人如林则徐，奏请以粤饷三百万两造船置炮，始终没有得到清朝统治者的理睬和支持。因为当时中国人挨打还挨得很不够，而且在当时像这样的有识之士也太少太少了。直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用枪炮帮助清朝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那些亲历其事的方面大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才承认西方国家制造的武器可以用来维护中国的面临严重内外危机的封建统治，兵舰和轮船快过木船，因此有办“洋务”的必要。洋务派的属员如冯桂芬、薛福成、邵作舟和一些同外国人有较多接触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在洋务开始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2～373页。

行之际，才敢于有比较进一步的设想，承认不仅有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必要，而且有设学校、报馆和议院的必要。但是对于采取这些措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真正懂得。在1894年中国在对日战争中遭到失败，面临着瓜分危机的严重时刻，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仓促形成，人们对西方的了解依然是非常肤浅的。因此，对中国究竟应当通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进行改造，认识很不清楚。当时讲的许多道理，现在看来，多半是夹七夹八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清末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说：“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① 这倒是很实在的。

由于对西方国家的茫然无知，所以尽管一边挨打，一边还是非常之狂妄自大。鲁迅在其名作《阿Q正传》中描写的阿Q精神实际上是清末民初中国人的这种特点的高度概括。这种阿Q精神是碰不得的，必须顺着它。不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还是革命党，都必须对这种阿Q精神表示尊重，不容稍有冒犯。凡讲要接受西方文化的某些内容，必须先颂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高峰。邵作舟所著《邵氏危言》是一本宣传变法的书，可是他的基本观点是“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认为“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复然出于万国之上，莫能及也”^②。所谓复然出于万国之上的道德、学问、制度、文章，一个最中心的内容就是孔孟之道。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开卷第一篇就说，不要害怕外国把各种各样的学问输入到中国来，将来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专集之34，第71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第1版，第182～183页。

还是会要“折入于孔孟之正”。他甚至说，西学本来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在那里得到了发展，现在把它学回来，正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当时如果不说这种颂扬传统文化、讨好顽固派的话，大概就只有不说话。郑观应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王韬是最早提倡变法自强的政论家，也是先讲变法符合孔子思想。显然，没有孔夫子的护符，变法就会被斥为邪说。

康有为号召维新，以尊孔为旗帜。他编了一本专门著作，名为《孔子改制考》，把孔子奉为“改制教主”。后来又向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主张建立孔教，所有宗教仪式完全模仿基督教。他的大弟子和政治上的亲密合作者梁启超不赞成建立孔教，但他也还是认为“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戊戌变法被镇压后，他用以谴责那拉氏的一大根据就是“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②他对孔子的尊崇，同康有为还是一致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主张用武装起义来推翻清朝政府，但是恰好是这样一些坚决的革命者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极力加以维护。他们的口号是“光复旧物”，凡是汉人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好的。他们对孔孟特别表示尊崇，因为他们认为导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孔。章太炎起草的《讨满洲檄》里面说：“惟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主，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前驱。”^③为了不致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革命派除了坚决推翻清朝统治以外，并不真正革命，反而维护旧文化、旧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47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267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289～290页。

道德，并与旧势力相妥协，联合他们来反对清政府。所以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有推翻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的伟大功绩，但是并没有引起社会制度的真正的变化，革命徒有其名，并无其实，使人们感到失望。鲁迅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他说：“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①

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观念的统治是如此之牢固，以致在近代迫切需要改造的时候，不论是只想稍有改变的人也好，倡言革命的人也好，都不敢轻易碰它一碰。要来一次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可见其难了。中国的封建传统，确如恩格斯所说，是“历史的惰力”，一种极端顽固保守而又难以觉察的习惯势力，在群众中无所不在，连革命者自己也在所不免。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传统思想的影响深入人心。如果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如果不能以十分猛烈和完全彻底的民主革命来摧毁它，而继续把它保留下来，它就势必会随时反过来吞噬革命，出现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反革命复辟，特别是在国家继续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时候。

二、五四运动前夕的彻底反封建思想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马上受到了旧势力的惩罚。他们以“反满”为号召把清朝皇帝赶下了台，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权力。真正掌握权力的是在清末兴起的大军阀袁世凯。袁世凯一上台，就施展阴谋诡计来收拾革命党人，准

^① 鲁迅：《习惯与改革》，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175页。

备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复辟帝制。

然而，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共和国，这毕竟是对延续两千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沉重打击，使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微弱，还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革命也没有触及到它。尽管如此，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在革命的冲击下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辫子是清朝统治者强加给各族人民的一个最使人感到耻辱的外部标志。把辫子剪掉，消除这个耻辱，提高了民族自尊心。跪拜礼节的废除也使人中间上下尊卑的形式上的区别简化了。孙中山在担任临时总统的短短三个月中，通令禁止买卖人口，禁止体罚刑讯，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称呼“大人”、“老爷”等等，把清朝统治下的种种恶政恶俗宣布为非法存在的现象，多少造成了“自由”、“平等”的风气。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使一些长期被压迫的人民误认为他们有了做人的权力，神气起来了。鲁迅在《阿Q正传》中的描写是很典型的，未庄人用惊惧的眼光看着贫雇农阿Q，而阿Q有一次也居然敢于跑到假洋鬼子家里去认他做革命同志。这样的变化确是从来没有过的，不能不引起一班守旧分子的敌视。康有为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慨叹“礼俗陵夷，人心败坏，风俗变革，廉耻扫地”^①，代表了这一派人对革命的看法。这些守旧分子感觉皇帝被推翻了，他们的日子也完了，精神上空虚不安。他们阴谋复辟帝制，于是便极力诋毁革命，把所有他们看不惯的革命现象，乃至从来就有的坏现象，一概说成是革命造成的结果，摆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号召建立孔教，作为预备步骤。守旧分子的尊孔呼声得到了一心想当皇帝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在“尊崇孔圣”的通令中恶

^① 《最近康南海文集》，1914年5月上海出版，卷5，第7页。

毒地攻击革命搞糟了，“邪说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①袁世凯和守旧分子各有各的用心，但攻击革命是一致的，一时此唱彼和，掀起了巨大的复辟逆流。资产阶级匆忙地拼凑起来的国民党，脚没有站稳，就被袁世凯打了下去，没落了。

可是这股逆流也使一些有识之士立即看出了问题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有时称这些人为“激进派”，有时又称他们为“新人物”，其中最早出现的一人为陈独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正在着手进行。在第一期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首次提出要求个人民主权利，反对封建制度和保守思想；要求改造社会，号召“战胜恶社会而不为恶社会所征服”；要求民族独立，反对锁国闭关；主张“崇实际而薄虚玄”，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青年》对旧社会的抨击在当时青年中激起的反响是十分强烈的。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吴虞等一个接一个在《新青年》发表论文抨击孔教和孔学，抨击封建礼法，在1915年到1918年间达到了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产生的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成果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始于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发表的胡适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和紧接着发表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他们要求改革文风和文学体裁，注意文法和创造性，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文学革命很快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就是伟大作家鲁迅的小说和散文。鲁迅的成就为新文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学革命不仅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而且对思想的解放有极大的影响，它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 袁世凯：《大总统通令》（1913年6月），见《历代尊孔记》，中国道德会1935年12月13版，第25页。

这种觉醒的进一步的表现和发展就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次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学生和工人群众为了反对外国侵略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是一种新的政治行动。这次运动是在 1917 年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和当时使全世界为之激动的欧洲革命运动影响下发生的，是中国民族的新觉醒，也是多年来猛烈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集中表现。新文化运动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有了采取群众性政治行动的可能。毛泽东同志把新文化运动称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

从前孔夫子的尊严是不可冒犯的，旧礼教、旧道德是不容许怀疑的，孝道尤其是不可违反的。人可以为伪君子，为假道学，却不可以批评纲常名教。“非圣无法”曾经是最大的犯罪，新文化运动对孔学的批判却是一场大规模的“非圣无法”的运动，其势头之汹涌，真是从古所未有。守旧分子攻击这个运动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伦理（忠、孝、节），破坏艺术（旧戏），破坏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等等。总之，使他们感到伤心的是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破坏，是思想领域的一次大扫除。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加以总结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1 页。

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①

当时所谓新文化，也还是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对孔学的批判中，人们以为这些很足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把共和制度维护下来。其实，这种文化，在中国叫做新文化，在世界已是旧文化，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的封建复古思想的联合进攻下，打几个回合，就站立不稳，只好偃旗息鼓，名存实亡了。首先是资产阶级所要维护的共和制度名存实亡。这个制度既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巩固，是一个行不通的制度。共和制度行不通，先进的人们就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号召下，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起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学的批判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关键，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对这个运动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② 因为没有那么一个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连民主主义的觉悟都没有，继续处于蒙昧状态，那就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建立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是难以指望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853页。

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854页。